

中国神话早期研究的资料搜集与理论译介

汪楠

摘要：20世纪前半叶（1901-1950）是中国神话学研究的起步、发展阶段，研究者所面临的重要任务一是中国神话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二是西方神话理论的译介。本文拟从这两方面入手，对这一时期中国神话研究者的资料搜集与理论译介工作做一扼要勾勒，以期揭示中国神话学早期发展的历史脉络，及当时研究者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关键词：中国神话；早期研究；资料搜集；理论译介

中图分类号：I20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11)01-0099-05

中国神话学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断努力，特别是20世纪上半叶，研究者在中国神话资料的积累、方法理论的建构这两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使得中国神话学逐渐成长为具有完整体系的独立学科。这一时期的学者，通过细致的爬梳搜集、整理本土神话资料，通过翻译、传播西方神话理论探索中国神话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在中国神话学这张白纸上书写了辉煌的一页。因此，客观公正的对他们的成绩和不足进行总结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从这两方面入手，对这一时期中国神话研究者的资料搜集与理论译介工作做一扼要勾勒，以期揭示中国神话学早期发展的历史脉络，及当时研究者做出的巨大贡献。

一、资料的整理与搜集

（一）神话资料的发掘整理

自20世纪初西方的神话学被引入中国之后，中国的神话学研究者就面临着神话资料的搜集与整理的巨大难题。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神话资料零散并且不成系统，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鲁迅、茅盾等学者早已指出过。鲁迅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更能集古传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①而茅盾在《中国神话

研究 ABC》^②中总结了另外两个原因：“一为神话的历史化，二为当时社会上没有激动全民族心灵的大事件以诱引‘神代诗人’的产生。”^③

正是由于存在这样的原因，所以对神话研究者来说，首要的任务就是搜集神话资料，但在什么样的范围内来搜集却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关于此问题，鲁迅在1925年《致傅筑夫、梁绳祯》信中给出了指导性的意见。鲁迅认为，“中国至今未脱原始思想，的确尚有新神话发生，譬如‘日’之神话，《山海经》中有之，但吾乡（绍兴）皆谓太阳之生日为三月十九日，此非小说，非童话，实亦神话，因众皆信之也。”^④所以在神话的搜集过程中应该注意搜集的范围，“中国之鬼神谈，似至秦汉方士而一变，故鄙意以为当先搜集至六朝（或唐）为止群书，且又析为三期；第一期自上古至周末之书，其根柢在巫，多含古神话，第二期秦汉之书，其根柢亦在巫，但稍变为‘鬼道’，又杂有方士之说，第三期六朝之书，则神仙之说多矣。今集神话，自不应杂入神仙谈，但在两可之间者，亦只得存之。”^⑤

茅盾在其《中国神话研究 ABC》一书的第一章中，通过对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关于中国神话资料不能全部保存而仅余

①《鲁迅全集》卷9，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4页。

收稿日期：2010-11-01

作者简介：汪楠（1981-），女，吉林通化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

②《中国神话研究 ABC》，1929年由世界书局刊行，署名玄珠，1978年再版易名为《中国神话研究初探》，收入《茅盾评论文集》，后又收入《神话研究》（1981）。

③茅盾《茅盾说神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④《鲁迅书信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67页。

⑤《鲁迅书信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66页。

零星的片断的原因分析之后,也提出了自己如何系统的清理中国神话资料的看法,茅盾认为中国古代的神话资料是由北、中、南三部分组成,“或者此北中南三部分的神话本来都是很美丽伟大,各自成为独立的系统,但不幸均以各种原因而歇灭,至今三者都存了断片”。^①同时,茅盾还在其《读〈中国的水神〉》一文中对搜集神话资料提出了另外的看法,“其一,从秦汉以前的旧籍中搜剔中国神话的‘原形’,重要材料就不能不是《山海经》、《楚辞》、《淮南子》等等;其二,从秦汉以后的书籍乃至现在的民间文学中考究中国神话的演变——各地的传说如何增修了中国原始神话,又如何因此增修而使中国原始神话不但失其原形而且日益凋落,又各地的传说如何互相影响,产生了庞杂而类似的许多‘传说的集团’。”^②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神话大部分都散存于各种古籍之中,因此,如何从繁杂的古籍中提炼出神话资料是神话研究者面临的重大难题,而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在从繁杂的古籍中提炼神话资料这方面做出了巨大的成绩。顾颉刚于1923年在《努力周刊》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著名的“层垒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引起学界激烈的讨论。他们通过对“传疑时代”史料的细致讨论和整理,搜集到大量的神话材料,为中国神话学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料前提。如顾颉刚、杨向奎在《三皇考》、吕思勉在《三皇五帝考》、《盘古考》、杨宽在《中国上古史导论》等文章中所做的努力,就是非常重要的例子。

茅盾在对中国古代神话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分析之后,于1934年在《读〈中国的水神〉》一文中,借着分析黄芝岗的《中国的水神》,指出治中国神话应该注意三个原则:第一是,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神话人物;第二是,同一地区的神话人物之间有相当的沟通;第三是,神话的产生有其必要的社会历史背景。很显然,这三条原则对于整理中国古代其他神话资料也同样有效。^③

在这一时期,除了上述诸人的研究之外,还涌现出大量神话资料的整理者以及研究著作,如陆侃如的《山海经考证》(1929)、钟敬文的《楚辞中的神话和传说》(1930)、郑德坤的《山海经及其神话》(1932)、杨宽的《盘古传说试探》(1933)、黄芝岗

的《中国的水神》(1934)、江绍原的《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1935)、苏秉琦、徐旭生的《试论传说材料的整理与传说时代的研究》(1936)、陈梦家的《商代的神话与巫术》(1936)、孙作云的《中国古代神话研究》(1937)、陈志良的《盘古的研究》(1940)、孔令谷的《我们检讨古史主张神话还原说》(1940)、徐旭生的《我们怎么来治传说时代的历史》(1943)、苏雪林的《〈天问〉里的后羿射日神话》(1944)、郑德坤的《巴蜀的神话传说》(1946)、袁圣时(袁珂)的《〈山海经〉里的诸神》(1948)、袁珂的《中国古代神话》(1950)等等,均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古代神话进行了搜集、整理。其中袁珂的《中国古代神话》一书,采用“夹叙夹议”的方式,把大量的神话资料,甚至于一些仙话和传说的资料,编连在一起。作者用一种文学的笔墨来对譬如天地的开辟、诸神与人类的诞生、人与自然的斗争、人神之间的矛盾、诸神之战、物种的起源、远国异人的奇闻、英雄的业绩以及先秦历史人物的传说等等,进行系统的叙述和描写,是对早期神话研究成果的一次系统总结和整理。

(二) 神话资料的民间搜集

中国古代神话除了见于古籍记录者外,民间口头流传也保存着大量的神话传说。在“五四”后,随着中国神话研究的逐渐兴起,存在于古籍中的神话资料逐渐被发掘出来。但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神话研究者渐渐认识到,除了古籍中保存的神话资料外,民间流传的活态神话具有更强的生命力,是神话研究的重要目标。正如钟敬文在1933年写给W·艾伯哈特博士的信中说的:“中国前代的神话和传说,除了一部分被收录于比较古老的某些文献之外,大部分是保留在较后起的文籍和现在的民间的口碑之中。”^④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神话作为民族文化传统中富有生命力的材料,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与认真挖掘。特别是以北京大学为发源地的中国现代民间文学运动,对于搜集、整理和研究包括神话在内的民间文学资料,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⑤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时局的艰难,各大高校均纷纷搬迁至西南,虽然生活、学习条件变得格外的困难,但却让大批的研究者有机会接触到边远山区少数民族的生活与风俗,也无意中促成了中国神话研究者将中

①茅盾《茅盾说神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②茅盾《茅盾说神话》,第170-171页。

③茅盾《茅盾说神话》,第175页。

④钟敬文《与爱伯哈特博士谈中国神话》,载《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⑤参见陈建宪《神还乡的引魂之幡——20世纪中国神话学回眸》,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1卷第3期,第132页。

国神话资料的整理和研究的重心转向了田野作业，大大地拓展了中国神话学研究的视野。正如马昌仪所说：“一大批民族学家、社会学家、文学研究家和美术史学家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少数民族神话田野考察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把神话学研究的视野大大地拓展了，观念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神话不再局限于汉文典籍上的古代记载，学者们拥有了许多现存的后进民族甚至还处于氏族社会末期的民族的依靠口口相传而保存下来的口头神话材料；这些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神话的发掘，不仅是数量和品种的增加，而且为中国古代神话中许多不能索解的问题提供了破译的线索和钥匙。”^①通过与少数民族人民长期的交流，学者们记录下了一大批有价值的信息，其中就有生活在前文字阶段的民族的神话传说资料。这些资料的获得，让学者们从书斋似的研究中跳出来成为可能，也使学者们用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中国的神话传说成为可能。

由于拥有了广泛的资料基础，这一时期的神话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如芮逸夫《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传说》（《人类学集刊》1938年1卷1期），楚图南《中国西南民族神话之研究》（《西南边疆》1938-1939年第1、2、7、9期），吴泽霖《苗族中祖先来的传说》（《革命日报·社会旬刊（贵阳）》，朱锦江《中国民族艺术中所见羽翼图腾考》（《金陵学报》1938年8卷1、2期），常任侠《巴县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金陵学报》1938年8卷1、2期），常任侠《重庆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时事学报·学灯》1939年41、42期），凌纯声《浙南畲民图腾文化的研究》（《人类学集刊》1939年1卷2期），马绍房的《夷边的人祖神话》（《边疆》1939年39期），吴泽霖《苗族中的神话传说》（《社会研究》1940年第1期），马长寿《苗瑶之起源神话》（《民族学研究集刊》1940年第2期），陈志良《蛮俗札记》（《说文月刊》1940-1941年第2期合订本），陈国钧《生苗的人祖神话》（《社会研究（贵阳）》1941年第20期），岑家梧《槃瓠传说与瑶畲的图腾崇拜》（《责善半月刊》1941年第6期），马学良《云南土民的神话》（《西南边疆》1941年12期），马学良《云南傣族（白夷）之神话》（《西南边疆》1942年15期），陈志良《广西蛮瑶的传说》（《社会研究》1942年46期），陈志良《广西东陇瑶的礼

俗与传说》（《说文月刊》1945年5卷3、4期）等作品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二、西方神话的译介

（一）神话理论的介绍

现代神话学并非中国本土的学问，是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下由西方传来的，西方神话学传入中国，主要经历了两种方式：直接地来自欧洲，间接地来自日本。但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都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必须将外文翻译为中文，神话理论的输入当然也不可能例外。正如王增永在《中国神话学史略》中谈到的那样：“西方现代神话学传入中国是在20世纪的初年，开始主要是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他们在日本接触到西方神话学的各种理论，然后将一些理论与中国神话相结合，加以介绍和分析。到20世纪20年代，神话学从小到大初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体系。”^②由此可见，中国神话学的形成和建立，离不开西方神话理论的引进，正是这些西方神话理论的译介，为中国神话学的建立和建设提供了理论武器。

20世纪初，中国学人陆续翻译西方学者的论著，在这些论著中首次出现了“神话”的概念，同时也包含了西方学者对神话的研究情况和理论方法，这些都为我国的神话学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1895年，严复翻译了英国人赫胥黎的《天演论》，书中提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在中国的学人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后来兴起的神话研究也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1903年，在几部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文明史著作（如高山林次郎《西洋文明史》、白河次郎、国府种德《支那文明史》等）中，首次出现了“神话”和“比较神话学”的字样。同年，严复又翻译了斯宾塞的《群学肆言》和英国学者甄克思的《社会通论》，后又与魏易共同翻译了哈伯兰的《民种学》。这些译著都涉及到了神话的性质以及神话与原生宗教的关系。^③1907年，周作人在《红星佚史序》中首次向中国学人介绍了英国神话学家安德鲁·兰和他的神话学理论。此后，1913年周作人又在《童话略论》（《儿童文学小论》，上海儿童书局1932年）中指出：“童话（Marchen）本质与神话（Mythos）世说（Saga）实为一体。”并且得出结论说：“今总括之，则治教育童话，一当证诸

^①马昌仪《中国神话学发展的一个轮廓》，载《中国神话学文论选粹》（上），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1页。

^②王增永《神话学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2页。

^③参见潜明兹《中国神话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页。

民俗学，否则不成为童话。”即明确提出民俗学对神话研究的价值。除周作人以外，其他的早期神话学者如：茅盾、单士厘、孙毓修、谢六逸、黄石等也都非常注重对西方神话学说的学习和借鉴，“特别是人类学派神话学家安德鲁·兰、泰勒、弗雷泽等人的神话理论以及以今证古的研究方法”^①，受到当时神话学者的广泛关注。这些西方神话理论的译介，为中国神话学的建立和建设提供了理论武器。

人类学派的神话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对20世纪中国神话学研究起到了巨大的影响，茅盾、鲁迅、周作人、钟敬文、赵景深等学者，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人类学神话学的理论。正如当代神话学家马昌仪指出的：“不妨说，中国近代神话学还在襁褓的时候，就处在人类学派神话学的影响之下了。”^②1932年郑振铎在《东方杂志》第三十期上发表了《汤祷篇》，其中就有一章专门讲述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的《金枝》。而在早期神话研究者中，茅盾对欧洲人类学派的神话学理论的吸收和利用最为彻底，如其在1928年就写过一篇《人类学派神话起源的解释》^③的文章，介绍人类学派神话学的理论，并对安德鲁·兰的神话学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而在1929年出版的神话研究专著《中国神话研究ABC》（世界书局）一书的第八章《结论》部分，更明确指出：“本编的目的只是要根据了安得烈·兰（Andrew Lang）所谓人类学的方法与遗形说的理论，把杂乱的中国神话材料估量一下，分析一下。”^④在该书中，茅盾充分利用了英国神话学家安德鲁·兰的理论，甚至于某些神话论文就是直接取材于安德鲁·兰的著作，如第六章《自然界的神话及其他》一文，就是根据安德鲁·兰《神话、习俗与宗教》一书的第五章写成。

神话与历史的关系，一直是神话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在西方就有所谓的“欧赫美尔主义”对神话与历史的关系进行探讨，这种理论的主要观点是，认为神话中包含着众多的史迹，神话中的神与半神最初都是历史上实有其人的帝王或者英雄，神话是被改装过的历史。这一理论在中国最早被称为“神话的历史化”。这一理论形成，对中国古代神话研究

产生了长期的影响，直到现在还有学者坚持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并用以指导神话研究。而在西方神话研究者中，利用此理论来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的代表性著作，就是冯沅君译介的著名汉学家马伯乐《书经中的神话》（1927）一书。马伯乐在该书中指出：“中国学者解释传说从来只用一种方法，就是‘爱凡麦’派的方法。为了要在神话里找出历史的核心，他们排除了奇异的、不像真的分子，而保存了朴素的残滓。神与英雄于此变为圣王与贤相，妖怪于此变为叛逆的侯王或奸臣。”^⑤而同时，黄石在其《神话研究》^⑥上编第四章中对“神话的历史化”与“历史的神话化”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一方面固然不能赞成历史派的说法，谓‘神话的人物，通通是历史的人物’，和‘神话完全是史事的讹传’，但他方面却不能不承认有一部分神话，确是历史的转变。”

此外，1926年，著名的宗教学、民俗学家江绍原译介了《宗教的出身与成长》一书，对西方宗教学理论进行了介绍。1928年，谢六逸在《神话学ABC》^⑦一书中，详细的介绍了西欧神话学，如其在前言中所说：“本书的材料，前半根据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西村真次氏的《神话学概论》；后半根据已故高木敏雄氏的《比较神话学》，此外更以克赖革氏的《神话学入门》为参证。”据此可知，谢氏所用之材料，均为介绍西方神话学理论的名著。1933年，李璜译述了法国学者葛兰言的《古中国的跳舞与神秘故事》（上海中华书局），葛兰言在序言中指出，他作此书的目的就是“给中国古史研究一个新的观点——社会学的观点”。1934年，林惠祥在其《文化人类学》一书中，对西方文化人类学理论的介绍。在该书的第五篇《原始宗教》之第十二章，还有题为《神话》的专章来介绍神话与宗教的关系。林氏指出，神话内容不全是宗教性质的，其中大部分和宗教混合，因为神话是原始心理的表现，而原始心理又极富于宗教观念。

另外，还有一本书应该特别提及，即由李安宅译的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商务印书馆1936年）一书，该书系由马林诺夫斯基所著的论文《巫术科学与宗教》和《原始心理与神话》合编而成，此书是马氏以功能学派

①马昌仪《中国神话学发展的一个轮廓》，载《中国神话学文论选粹》（上），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

②马昌仪《人类学派与中国近代神话学》，载《民间文艺集刊》第1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③此文最初发表于1928年《文学周报》第6卷第19期。

④茅盾《茅盾说神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

⑤[法]马伯乐著，冯沅君译《书经中的神话》，长沙：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出版，商务印书馆发行，1939年版，第1页。

⑥此书初版于1927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刊行，1988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重新影印出版。

⑦此书初版于1928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刊行。

的独特眼光和方法,研究原始社会的巫术宗教与神话的重要著作。书中提出的观点对中国神话研究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其在书中对“自然派神话学”、“历史派神话学”、“社会派神话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些论述使中国神话研究者认识到了这些理论的缺陷,从而在研究中尽量地避免犯类似的毛病。马氏经过细致的分析之后,最终指出:“神话在原始文化中有必不可少的功用”,即提出了著名的功能主义神话观。该理论在世界神话学领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对中国神话学研究也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如最近还有学者利用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观来分析中国神话中的女娲神话与女娲信仰,取得重要的突破。作者认为:女娲神话具有解释和证明、教化、娱乐,以及对女娲信仰的个性化和强化作用;而与之相关的女娲信仰,在生活中则具有凝聚和维系群体、规范群体成员、调节群体生活的作用,对社区中的妇女还具有多种特殊的功能。同时指出,这些功能是女娲的神话及其信仰能够长期延续,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①

(二) 神话故事的编译

此时期,除了大量神话理论的译介和流传外,各种介绍西方神话故事的书籍也相继出现,为国人了解西方神话提供了机会。1907年,周作人把英国学者葛哈德和安德鲁·兰根据荷马史诗创作的神怪小说《红星佚史》(《说部丛书初集》第78编)翻译过来。同年,《说部丛书》出版了巴德文著《希腊神话》的中译本。1910年,祖籍浙江萧山的女学者单士厘在其所著《归潜记》中的《章华庭四室》和《育斯》(今译作宙斯)中,介绍了希腊罗马神话。1928年,沈玄英在《小说月报》19卷8期上发表《希腊神话与北欧神话》,更为详细的介绍了希腊与北欧神话。《小说月报》1930年21卷第1期及1932年22卷第6期又刊载了西谛(笔者按:指郑振铎)的《希腊罗马神话与传说中的英雄传说》,这些均是早期研究者对欧洲神话故事的介绍。

这一时期,在西方神话故事的编译方面,贡献最大的还是茅盾。20世纪20年代,以茅盾为代表的神话研究者,编译介绍了大量的古希腊罗马神话和北欧神话,茅盾曾指出其中的原因:“欧洲最新的文艺思潮还传不到中国,因而也给我一个机会对十九世纪以前的欧洲文学作一番系统的研究。这就是我当时从事于希腊神话、北欧神话之研究的原因。”

^①杨利慧《女娲的神话与信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②由于当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藏的外文书籍十分丰富,所以为茅盾的编译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仅1924年9月至1925年4月这8个月的时间里,茅盾就以“雁冰”和“沈雁冰”的笔名,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儿童世界》上连载了《普洛末修士偷火的故事》、《迷达斯的长耳朵》、《何以这世界上有烦恼》、《菽耳的冒险》、《喜芙的金黄头发》等11篇希腊与北欧神话故事。1926年,茅盾继续以“沈雁冰”为笔名在《民铎》7卷第1期上发表了《各民族的开辟神话》。1928年,茅盾又以“玄珠”为笔名在《文学周刊》第5期上发表了《各民族的开辟神话》的姊妹篇《各民族的神话何以多相似》。1929年,茅盾以“玄珠”为笔名又在《文学周刊》第7卷上连载了《希腊罗马神话的保存》、《埃及印度神话之保存》、《北欧神话的保存》三篇文章。茅盾之所以能够创作出如此丰富的作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茅盾早期对于古希腊罗马及北欧神话的译介。1930年,茅盾以“方璧”为笔名出版了《北欧神话ABC》^③一书,该书是茅盾研究北欧神话的代表作,也是其早年译介北欧神话的重要延续。

20世纪的中国神话学在融汇中、西两种学术传统的基础上得以确立,在新世纪的初始,当我们重新审视上一个世纪中国神话学的发展历程时,深深感受到早期研究者在中国神话学草创阶段的艰辛,从神话资料的搜集、整理,到西方神话学理论的译介、传播,都浸染着他们的汗水,如鲁迅对中国神话资料散佚原因的探讨,茅盾对中国神话的整理以及研究方法的构建,闻一多利用外国神话理论进而研究中国神话等等。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使得中国神话学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也为后世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神话资料,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开拓了广阔的研究。相信在新的世纪里,中国神话学研究将会在多领域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责任编辑:闫丽)

^②茅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二》,见《茅盾专集》第一卷·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8页。

^③此书初版于1930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刊行,署名方璧,后收入《茅盾全集》,198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